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說之論析

王鵬凱*

一、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的正反意見

《四庫全書總目》向來被學者視為治學之指南¹，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而對於《四庫全書總目》的著作權，自清代以來，學者大多傾向歸於總纂官紀昀。周積明曾將這些說法一一列舉出來²，今增益他家說法表列如下：

提出者	出處	說法
朱珪	紀曉嵐墓誌銘	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裒然巨觀。
朱珪	祭紀昀文	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注。
阮元	紀文達公遺集序	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扶輿提綱，溯源徹委。所擬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
劉權之	紀文達公遺集序	（高宗純皇帝）特命吾師總纂。《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
陳鶴	紀文達公遺集序	其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
江藩	漢學師承記	《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
昭槤	嘯亭雜錄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¹ 如張之洞《輜軒語·語學》卷一：「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夫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柳子厚好讀《國語》，乃能作《非國語》，蓋必與之相習，然後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學問門徑，實受《提要》之賜，逮至用力之久，遂掩摭利病而為書，習慣使然，無足怪者」；王運熙《古典文學文獻及其檢索·序》：「《四庫提要》對我是一位最好的老師，它教給我的東西，比過去學校中任何一位老師教給我的還要多」。

² 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 70-73。

		《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辭淡而雅，人爭服之。
洪亮吉	北江詩話	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為贍博。
張維屏	聽松廬文鈔	或言紀文達公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餘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
陸敬安	冷廬雜識	《全書總目》二百卷，亦公所撰，說者謂公才學絕倫，而著書無多，蓋其平生精力已畢萃於此書矣。
李元度	紀文達公事略	公胸有千秋，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發之。
清仁宗	御賜碑文	美富羅四庫之儲，編摩出一人之手。
郭伯恭	四庫全書纂修考	《總目提要》之編纂，原為各纂修官於閱書時分撰之，嗣經紀昀增竄刪改，整齊劃一而後，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一人之主張而已。
陳垣、尹炎武	影印《四庫全書》 原本提要緣起	現行《四庫全書總目》本擷取各書提要而成，後經文達筆削一貫。
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序錄》	（《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不及定本（指單刻本《總目》）之善……紀氏恃其博洽，往往奮筆直書，而其謬誤乃益多，有並不如原作（《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之矜慎者。
張舜徽	中國文獻學	他（紀昀）既寫成了兩百卷的《總目提要》，當時最高統治者苦其繁多，紀氏又另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
(日)前野直彬	論明清兩種對立的小說理論--金聖嘆與紀昀	《提要》是由各方面的專門學者分別執筆，但經總纂官紀昀大加訂正之後才定稿的。雖然小說類這部分的原稿究竟是誰寫的，紀昀的改革佔多大分量，都不清楚，但反正這部分的論述無疑是為紀昀所完全同意的了。在這意義上，認為《提要》的小說論即是紀昀本人的主張也無不可。

從前面的資料看來，雖然有不少學者認為紀昀纂修《四庫全書總目》，而且紀昀本人也曾多次言及他撰述《四庫全書總目》（資料於後詳述），但

是也有學者不以為然，反對將《四庫全書總目》的著作權歸之於紀昀。如「即使《總目》的思想和紀昀完全合轍，也只能說是紀昀的想法正好符合乾隆帝……筆者也主張《總目》表現的是乾隆帝的思想；或者說表現當代學術共識，而非某一位單獨個人的思想概念，至於紀昀等人所扮演的，就如同現代的『總統府發言人』、『新聞局長』或所謂『文膽』之類的腳色，不過是代筆人而已」³、「館臣的手筆，傳達的當然是清王朝的意見」⁴、「紀昀所言不實，自我表揚，將其他人的勞績一筆抹殺，似有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之嫌。以此一面之詞為證據，明顯缺少旁證。紀昀在所撰《進表》及其他文章時又將著作權推給清高宗」⁵。這些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四庫全書總目》展現的是清王朝或是乾隆皇的思想，無法展現紀昀的思想意見。（二）以《四庫全書總目》之作歸功於紀昀，是將其他人的勞績一筆抹殺。所以爭議的關鍵在於：官修著作可否有編者意識？《四庫全書總目》經紀昀「一手刪定」後的著作權問題？今試以紀昀私人著作《紀曉嵐文集》中的資料，參酌近人之研究成果，舉例來說明紀昀確有撰述《四庫全書總目》之功。

二、《四庫全書總目》紀昀思想見解展現之例

文化水準頗高的乾隆帝，對《四庫全書》的編纂相當的關注，這從《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中的上諭就可以看出來⁶，但是乾隆帝身為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者，日理萬機又非專業的學者，對《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是有指導和規範的作用，但在大原則大方向外，很難想像他能深入到細部的工作。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二百卷的份量就讓他難以卒讀，因此才會下旨編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但就算是卷數縮減至十分之一的《四庫

³ 楊晉龍，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詩經學的評價，（濟南）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999。

⁴ 劉九生，循環不息的夢魘——陰陽五行觀念及其歷史文化效應，（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138。

⁵ 司馬朝軍，紀昀與《四庫全書總目》，圖書館雜誌，2007：2，頁 72。

⁶ 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內收的 1550 件檔案中，可以看出乾隆帝關注的焦點，從編纂開始對蒐集書籍求其「全」，到後來轉變為關注於「禁毀書籍」。他的諭旨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總綱和指導原則，包含了編纂目的、編纂體例、編纂校勘、編書取捨、古籍改編、文化傳播等範圍，詳參戚福康，《四庫全書》乾隆御旨平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6 期、2002.1 期。

全書簡明目錄》，也讓他發出：「簡明目錄從頭閱，向若已驚徒眈洋！」的感嘆，且在詩後自注：「向因編輯全書總目提要，卷帙甚繁，令紀昀別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以便繙閱，然已多至二十卷，檢查亦殊不易」⁷，相較於他對《四庫全書》中違礙之處的關注，《四庫全書總目》多達 10231 種的提要，乾隆無論是在精力、耐力、興趣、學識上，恐怕無法起多大的指導作用，因此《四庫全書總目》工作的完成，還是有賴於他所信賴的臣工－紀昀⁸等人，王重民認為：

1782-1787……所以這五年之內，應該是紀昀專心致志對《四庫全書總目》做整齊劃一工作的時期，進一步充實了它的內容，……
1787-1793……當紀昀被罰校閱《四庫全書》錯誤的時候，他奏請認勘「明季國初史部、集部、子部及小說雜記等書」，那都是乾隆認為有問題、最不放心的書籍，有機會由紀昀統閱一過，不但改正了其中違礙的地方，還借此修正了這些書的提要。……尤其是紀昀把明清之間的史、子、集三部書的提要重新修改過了，才決定由武英殿刊版的。刊成的日期約在 1793 年冬季。⁹

因此除了政治上的禁忌與違礙，紀昀必須小心謹慎地仰承聖意，避免批及逆鱗外，而在學術上的見解，這位「文膽」、「代筆人」又豈能將一萬多種提要，件件揣摩聖意後方能下筆，而絕無自己絲毫的見解？甚至反過來看，乾隆對於這萬餘種書籍的了解，恐怕絕大多數還是要靠《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見解。因此，在乾隆無法親力為之的情況下，《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必須依賴乾隆信賴的臣工完成，除了乾隆最關注的政治上違礙問題外，學術上的見解自必是由「文膽」、「代筆人」料理之，其中也自必有這位「文膽」、「代筆人」的學術思想見解。但因為《四庫全書總目》是官修

⁷ 《欽定四庫全書御製詩》五集，卷六十七，古今體一百十二首題文津閣。

⁸ 乾隆三十三年（1768），紀昀授貴州都勻府知府，乾隆立即下諭以四品銜，仍留庶子任。理由就如嘉慶〈御賜碑文〉中所說的「遂荷先帝特達之知，獨蒙學問素優之譽。一麾出守，劇任恐掩佳才，四品加銜，殊恩特邀破格」（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三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723），在此可以看出乾隆對紀昀學問的賞識，日後紀昀得以出任總纂官，是其來有自。況且《四庫全書》書成後，另外兩位總纂官陸錫熊與孫士毅皆外放，獨紀昀仍留京師，繼續於完成《四庫全書總目》的工作，也可看出乾隆對紀昀的看重。

⁹ 王重民，論《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大學學報，1964 第 2 期，頁 64-65。

的書，因而說其中的思想代表著乾隆的思想也未為不可，因為該書原名有「欽定」二字，是經皇帝認可後刊行的。若依《呂氏春秋》之例，書成於眾賓客之手而掛名呂不韋，則本書可掛名永瑤，但實際上又有幾人視此書為永瑤的著作。至於紀昀在〈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中先謙稱「臣等功謝囊螢，識同窺豹」，幸「所賴恭承睿鑒，提玉尺以量才；仰稟天裁，握銀華而照物」，然後「一經聖主之品題，立分白黑」，最後「凡茲獨斷，咸稟睿裁；懿此同情，實孚公義」¹⁰，把著作權歸之於乾隆，一切意見皆是乾隆意識的展現，這是在帝王時代，官修的書籍「書秉聖裁，垂型萬世」的官樣說法，「欽定」二字向來就是帝王的專利，輕鬆地坐享成果。但時至今日還要依此慣例，而不能還原實際狀況嗎？許多官修的書，雖奉敕而成，但如今已多能將著作權歸諸於編者，如《新唐書》為宋仁宗下詔重修，至今則視之為歐陽脩的著作；沈約奉詔撰《宋書》，《宋書》已視為沈約的著作；《諸病源候論》是隋代太醫博士巢元方等人奉敕所編著，而今有誰會將著作權歸之於隋煬帝？就連清朝幾部官修的書，如《續文獻通考》（清張廷玉等奉敕撰）、《續通典》（嵇璜、劉墉等奉敕撰）、《續通志》（嵇璜、劉墉等奉敕撰），時至今日都能對作者有清楚的交代，惟獨《四庫全書總目》尚視之為乾隆之禁臠，撰寫人只能是無己見的「發言人」？如果說其中無撰者的學術思想見解，那麼所有官修之書，豈不都只能掛皇帝老爺之名了？接著，筆者在紀昀的私人著作中，舉出幾處和《四庫全書總目》思想見解契合之例，今陳述如下：

(一)對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的批評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一則藉著二位不知是仙是鬼的對談，提出了對張載《西銘》和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的質疑，可以視為紀昀藉著鬼仙之口，對宋明理學的批判：

左一人曰：「去時方聚講《西銘》，歸時又講《大學衍義》也。」右一人曰：「《西銘》論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心知此理，即道濟天下乎？父母之於子，可云愛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而已。此猶非一身也。人之一身，慮無不深自愛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療？己之患難，何以不能救？」

¹⁰ 《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116-119。

亦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舉，萬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學》條目，自格致以至治平，節節相因，而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學衍義》，列日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猶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漢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歸本於齊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為飯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瓊山所補，治平之道其備乎？」右一人曰：「真氏過於泥其本，邱氏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瑣瑣屑屑，縷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即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即逾千百，又何為抵乎？亦妄談而已矣。」¹¹

試將《四庫全書總目》中《大學衍義》提要所言：「其理雖相貫通，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¹²和《四庫全書總目》中邱濬《大學衍義補》提要：

又力主舉行海運，平時屢以為言，此書更力申其說。所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內河挽運之資，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為抵乎？…然治平之道，其理雖具於修、齊，其事則各有制置，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穀，穀可為米，米可為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則禾不長，禾不獲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遞溯其本，謂土可為飯也。¹³

¹¹ 〈姑妄聽之〉卷三，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453-455。

¹² 《四庫全書總目》卷92，（北京）中華書局，1997，上冊頁1216-1217。

¹³ 《四庫全書總目》卷93，（北京）中華書局，1997，上冊頁1225。

與《閱微草堂筆記》所言兩相對照，實無二致，不僅意思相同，連所舉的例子也一樣。在《閱微草堂筆記》這篇長篇大論中，首先提出光是「心知此理」是無法「道濟天下」，還是要有「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的「術」，所以舉「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之例，來說明《大學》修齊治平「節節相因」，「亦節節各有其功力」，是節節各自有其「有治法在」、「有政典存」。對照《大學衍義》提要所言：「其理雖相貫通，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提要是比《閱微草堂筆記》的批評含蓄客氣多了，接著提要點出因為真德秀所言有所不足，所以邱濬才會補真德秀未盡之處，但紀昀對海運船難所造成物料、人命的損失，「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即逾千百，又何為抵乎」、「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為抵乎？」不論在《閱微草堂筆記》或在《四庫全書總目》，同樣都是嚴詞痛斥不以為然。今將兩者列表對照如下：

	《閱微草堂筆記》	《四庫全書總目》
認為光是「心知此理」是無法「道濟天下」	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	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穀，穀可為米，米可為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則禾不長，禾不穫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遞溯其本，謂土可為飯也。
批評邱濬海運之失	即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即逾千百，又何為抵乎？	所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內河挽運之資，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為抵乎？

(二)對王士禛、趙執信詩論之爭的意見

清初王士禛與趙執信兩人的關係及其詩學論爭一直是詩學史研究中的熱門話題，《四庫全書總目》曾對王漁洋、趙執信二人論詩宗旨的爭論，分析其理論產生的背景因素，並加以評述、比較：

平心而論王以神韻縹緲為宗，趙以思路劇刻為主。王之規模闊

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于王，而末派病於纖小。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正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

14

蓋明詩摹擬之弊，極於太倉、曆城；纖佻之弊，極於公安、竟陵。物窮則變，故國初多以宋詩為宗。宋詩又弊，士禎乃持嚴羽餘論，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其推為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於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群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煙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別為山水清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為鈍根。士禎又不究興觀羣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論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謂歟！¹⁵

詩自太倉曆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為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其後風流相尚，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爭，所作《談龍錄》排詆是書，不遺餘力。其論雖非無見，然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今仍並錄存之，以除門戶之見。¹⁶

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除了說明兩家詩論產生的背景外，主要提出兩家詩論「其論雖非無見」，但是「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因此「論甘忌辛，是丹非素」遂成相爭，如果「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然後「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最後結論為「殊途同歸，未容偏廢」。

同樣的意見，紀昀也在〈袁清愨公詩集序〉提及，還是認為要「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

漁洋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妙悟醫鈍根；而飴山老人

¹⁴ 〈因園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 173，（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225。

¹⁵ 〈御選唐宋詩醇〉提要，《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 190，（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660。

¹⁶ 〈唐賢三昧集〉提要，前揭書，頁 2662。

顧執「詩中有人」之說，以抵瑕而蹈隙。左右佩劍，彼此互譏。論者謂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是亦掃門戶之見也。¹⁷

甚至還在〈灤陽消夏錄〉卷三中，還記載一則木魅調停趙執信和王漁洋兩家詩說的故事來，除了分析漁洋山人詩的優劣外，也不忘說明一下兩家詩論產生的背景，而最主要的意見，還是在強調「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見解：

益都李詞畹言，秋谷先生南遊日，借寓一家園亭中。一夕就枕後，欲制一詩，方沉思間，聞窗外人語曰：「公尚未睡耶？清詞麗句，已心醉十餘年。今幸下榻此室，竊聽緒論，雖已經月，終以不得質疑問難為恨，慮或倉卒別往，不罄所懷，便為平生之歉。故不辭唐突，願隔窗聽揮塵之談，先生能不拒絕乎？」秋谷問：「君為誰？」曰：「別館幽深，重門夜閉，自斷非人跡所到，先生神思夷曠，諒不恐怖，亦不必深求。」問：「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懷蕭散，僕亦倦於儀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內耶？」秋谷因日與酬對，於六義頗深。如是數夕，偶乘醉戲問曰：「聽君議論，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詩乎？」語訖寂然。穴隙窺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簷角而去。園中老樹參天，疑其木魅矣。詞畹又云：「秋谷與魅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藝五穀；如雕欄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疊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繡，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進規諫。』秋谷極為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奏，故漁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勢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秋谷頗不平之云。」¹⁸

對王、趙二人詩論之爭，《四庫全書總目》和紀昀私人著作看法，實無二

¹⁷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198。

¹⁸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57。

致，今表列如下，：

	《四庫全書總目》	紀昀私人著作
王、趙二人詩論之爭的看法	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 然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	論者謂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 勢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三)對戴震《聲韻考》的評論

自乾隆二十年戴震避禍入京結識紀昀後，兩人相交二十餘年，「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¹⁹、「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²⁰，紀昀還曾出資將戴震的《考工記圖》付梓，並為之作序²¹，戴震還因紀昀的推薦進入四庫館任纂修官一職，在在都說明二人的交誼匪淺。但是在學術上兩人還是有一次意見相左的經驗，紀昀於日後在〈與余存吾太史書〉一信中詳述經過，並希望余存吾（廷燦）在刊行《戴東原事略》時能刊改戴震之誤：

昀再拜啟，存吾太史閣下：承示《戴東原事略》，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略須商榷。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為弁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考》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為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為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為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為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為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為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極群書，此條不應不見；昀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己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為，是亦通人之蔽也。

¹⁹ 〈與余存吾太史書〉，前揭書，頁 274。

²⁰ 〈偶懷故友戴東原〉，前揭書，頁 531。

²¹ 〈考工記圖序〉，前揭書，頁 157-158。

若始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為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昀於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於左右，祈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采，惟高明詳裁之。²²

紀昀一方面感慨當年在戴震刊行《聲韻考》時，未能盡朋友規過之義。一方面也點出戴震之用意在於「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同樣的意見，也見諸《四庫全書總目》的《重修玉篇》提要：

近時休寧戴氏作《聲韻考》，力辯反切始魏孫炎不始神珙，其說良是。至謂神珙以前無字母之說，神珙字母乃剽竊儒書而托詞出於西域，則殊不然。考《隋書·經籍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則遠在孫炎前。又《釋藏》譯經字母，自晉僧伽婆羅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亦遠在神珙前。蓋反切生於雙聲，雙聲生於字母，此同出於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華者也。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於聰明之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緒。特神珙以前自行於彼教，神珙以後始流入中國之韻書。亦如利瑪竇後推步測驗參用西法耳，豈可謂歐羅巴書全剽竊洛下，鮮於之舊術哉？戴氏不究其本，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後，遂據其末而與之爭，欲以求勝於彼教。不知聲音之學，西域實為專門。儒之勝於釋者，別自有在，不必爭之於此也。²³

文中除了引經據典以辯駁戴震之非相同外，同樣也是點出戴震的用意是「欲以求勝於彼教」，像是出自對戴震熟稔之人的手筆。相較於〈與余存吾太史書〉信中稱「昀於東原交不薄」，因為熟知戴震，才指出戴震「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的用意，兩者批評的思路顯然是相同的，都是對戴震「西學中源」主張的不以為然，今試以表列兩者比較如下：

²² 前揭書，頁 274-275。

²³ 《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 41，前揭書，頁 539。

	《四庫全書總目》	〈與余存吾太史書〉
肯定戴震主張反切始於孫炎之說	力辯反切始魏孫炎不始神珙，其說良是。	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為鼻祖。
辨駁戴震主張神珙字母乃剽竊儒書之說	考《隋書·經籍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則遠在孫炎前。又《釋藏》譯經字母，自晉僧伽婆羅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亦遠在神珙前。蓋反切生於雙聲，雙聲生於字母，此同出於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華者也。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於聰明之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緒。特神珙以前自行於彼教，神珙以後始流入中國之韻書。	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為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為孫炎之末派旁支哉！
指出戴震用意	欲以求勝於彼教。	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

(四)對李商隱〈無題〉詩的分析

紀昀用了很多的精力，要去矯正祖唐祧宋兩派詩論的偏頗，希望能於兩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我們看他評點整理過的書，便可以知道為何他喜歡對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加以評點和圈閱。如方回的《瀛奎律髓》、李商隱的《玉谿生詩集》，馮舒、馮班批閱的《才調集》等，又對杜甫、蘇軾、陳師道、黃庭堅等人的詩作也曾作過評點。可見紀昀對這些書的評點，正是有意圍繞對此兩派的評價而開展的。而這些意見，同樣地也散見於《四庫全書總目》中，今舉李商隱、陳師道之例於後。早在乾隆十五年，紀昀丁內艱時即完成《玉谿生詩說》一書²⁴，中評〈八歲偷照鏡〉二首稱：

〈無題〉諸詩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有戲為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有本事者，如「昨夜星

²⁴《玉谿生詩說》紀昀自題：「秋冬以來，居憂多暇，因整理舊業，編纂成書。乾隆庚午十一月」。

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而後人題曰〈無題〉者，如「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詩相連，失去本題，誤合為一者，如「幽人不倦賞」是也。宜分別觀之，不必概為穿鑿。²⁵而後出的《四庫全書總目》中，論李商隱〈無題〉詩所言，除字句稍有出入外，幾乎同出一轍，又是紀昀學術意見展現於《四庫全書總目》之一例：然〈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有戲為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為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為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一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²⁶

在此紀昀特別指出李商隱〈無題〉諸詩創作意旨之不同應細分之，提醒觀者避免對李詩本旨之誤解，今將兩者所言表列之：

	《玉谿生詩說》	《四庫全書總目》
有確有寄託者	「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	「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
有戲為艷體者	「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	「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
有實有本事者	如「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	
有失去本題而後人題曰〈無題〉者	「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	「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
有與〈無題〉詩相連，失去本題，誤合為一者	如「幽人不倦賞」是也。	「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
推及他類作品		其摘首二字為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一例。
結語	宜分別觀之，不必概為穿鑿。	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

(五)對陳師道作品的評論

乾隆二十七年六月，紀昀從座師錢茶山（維城）處借閱《後山集》，至乾隆二十九年七月晦日作序，書於福州使院之鏡煙堂，刪定《後山集》

²⁵ 《玉谿生詩說》上卷頁 14，(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緒丁亥年朱記榮輯刊本影印本，1970。

²⁶ 《李義山詩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 151，(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021。

完成。在紀昀〈後山集詩鈔序〉一文中，紀昀對陳師道各類作品詳加評論，詳述其優劣。

其五言古，剗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枒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為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嶄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絕，則純為少陵遺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棄短取長，要不失為北宋巨手。……其古文之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可參置於昌黎、半山之間。雖師子固，友子瞻，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似較其詩為過之，顧世不甚傳，則為諸巨公盛名所掩也。²⁷

《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後山集》提要，一樣是對陳師道各類作品詳加評論，詳述其優劣，而且和〈後山集詩鈔序〉所述，如出一轍：

其五言古詩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處，則未脫江西之習，七言古詩頗學韓愈，亦間似黃庭堅，而頗傷謇直，篇什不多，自知非所長也。五言律詩，佳處往往逼杜甫，而間失之僻澀。七言律詩風骨磊落，而間失之太快太盡。五、七言絕句，純為杜甫遺興之格，未合中聲，長短句亦自為別調，不甚當行。大抵詞不如詩，詩則絕句不如古詩，古詩不如律詩，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實不在李翱、孫樵下，殆為歐、蘇、曾、王盛名所掩，故世不甚推。棄短取長，固不失為北宋巨手也。²⁸

如果將兩者表列出來，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的確是如出一轍。〈後山集詩鈔序〉除了未對詞作評論外，無論是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七言絕句、詩詞的總評、古文的總評都較《後山集》提

²⁷ 〈後山集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184-185。

²⁸ 《後山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154，(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068。

要詳細，但提要則顯得更為精要。當然也可以看出，紀昀已將自己的學術思想和見解灌注於《總目》內：

	〈後山集詩鈔序〉	《後山集》提要
五言古詩	劖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枒則不免江西惡習。	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處，則未脫江西之習。
七言古詩	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為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	頗學韓愈，亦間似黃庭堅，而頗傷饒直，篇什不多，自知非所長也。
五言律詩	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	佳處往往逼杜甫，而間失之僻澀。
七言律詩	嶽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	詩風骨磊落，而間失之太快太盡。
五七言絕句	則純為少陵遺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	純為杜甫遺興之格，未合中聲。
詞		長短句亦自為別調，不甚當行。
詩詞的總評	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棄短取長，要不失為北宋巨手。	詞不如詩，詩則絕句不如古詩，古詩不如律詩，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
古文的總評	其古文之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可參置於昌黎、半山之間。雖師子固，友子瞻，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似較其詩為過之，顧世不甚傳，則為諸巨公盛名所掩也。	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實不在李翱、孫樵下，殆為歐、蘇、曾、王盛名所掩，故世不甚推。棄短取長，固不失為北宋巨手也。

三、紀昀自稱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是個謊言？

究竟紀昀是否「將其他人的勞績一筆抹殺」而謊稱他編撰了《四庫全書總目》，筆者試著從下列三個方向來探討：

(一)紀昀的自述

除了前面提到的學者認定外，紀昀自己也曾多次提及他和《四庫全書總目》的關係，有的是直言撰寫《四庫全書總目》：

余初學詩從《玉谿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窺涯涘。嘗有場屋為余駁放者，謂余詆謫江西派，意在煽構，聞者或惑焉，及余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蜚語，群疑乃釋。²⁹

余於癸巳受詔校秘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為《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為之輔。³⁰

案相人之法，見於左傳，其書《漢志》亦著錄。惟太素脈、揣骨二家前古未聞。太素脈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淵源皆支離附會，依託顯然。余於《四庫全書總目》，已詳論之。揣骨亦莫所自起。³¹

此迦陵先生之故硯，伯恭司成以贈石庵相國。余偶取把玩，相國因以贈余。迦陵四六，頗為後來所嗤點，余撰《四庫全書總目》，力支柱之。³²

有論及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案語之事：

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甯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併附案語曰：「謹案練子甯以下八人，皆惠宗舊臣也。考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等後者。然一則效死於故君；一則邀恩於新主，梟鸞異性，未可同居，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辛醜，更遠在縉等後，今亦升列於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黃泉易逝，青史難誣，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佻薄廢乎？³³

²⁹ 〈二樟詩鈔序〉，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200。

³⁰ 〈詩序補義序〉，前揭書，頁156。

³¹ 〈灤陽續錄〉卷一，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494。在《四庫全書總目》卷110〈太素脈法〉提要、卷105〈醫史〉提要都曾批評太素脈法荒誕之說。

³² 嘉慶戊午(嘉慶三年，1798年)十月，紀昀為劉墉(號石庵)所贈硯作硯銘。《閱微草堂硯譜》，紀昀，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23。

³³ 〈姑妄聽之〉卷四，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479。《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170案語：「案練子甯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諸人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效命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同器，于義未安。故分列編之，使

也有言及《四庫全書總目》編次：

惟《詩》則托始小序，附以辨說，以著爭端所自起，終以范蘅洲之《詩瀋》、姜白岩之《詩序補義》、顧古湫之《虞東學詩》，非徒以時代先后次序應爾也。³⁴

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甯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³⁵

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謂禮樂兵刑國之大柄也。農家、醫家，舊史多退之於末簡，余獨以農家居四，而其五為醫家。農者民命之所關，醫雖一技，亦民命之所關，故升諸他藝術上也。³⁶

又有稱撰寫《四庫全書總目》總序、類序：

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雲靜，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³⁷

余作《詩類總序》有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予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與！³⁸

余向纂《四庫全書》，作經部詩類小序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出爾反爾，勢于何極。³⁹

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己醜，更遠在縉等之後。令亦升列縉等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也。」（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287。

³⁴ 〈詩序補義序〉，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頁 156。

³⁵ 〈姑妄聽之〉卷四，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479。

³⁶ 〈濟眾新編序〉，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頁 179。

³⁷ 〈灤陽消夏錄〉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頁 10。

³⁸ 〈詩序補義序〉，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頁 156-157。

³⁹ 〈周易義象合纂序〉，前揭書，頁 154。

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為之輔。⁴⁰以及校定、勘定《四庫全書總目》之事：

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⁴¹

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其體已無所不備。⁴²

余勘定四庫書，頗恨其空言聚訟也。⁴³

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

44

究竟是紀昀一再地撒謊？還是確有其事？如果是「紀昀所言不實，自我表揚，將其他人的勞績一筆抹殺，似有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之嫌」，如此一來紀昀倒是個卑鄙無恥之徒了，再則紀昀如此公開地撒了漫天大謊，為何不見學者群起攻之⁴⁵？就算紀昀當時算是顯赫人物，全天下學者竟無一人敢捋虎鬚，乾嘉之後，道、咸、同、光朝之人，也豈無一人是丈夫？反倒是有多人認為他寫成《四庫全書總目》。而紀昀的為人，究竟是否如此不堪呢？從資料上看來，紀昀最被常提到的缺點就是好色的問題，如與紀昀同時之滿清權貴禮親王昭槿《嘯亭雜錄》中稱：「(公)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穀，真奇人也」⁴⁶，紀昀也自稱「昀頗蓄

⁴⁰ 〈詩序補義序〉，前揭書，頁 156。

⁴¹ 〈濟眾新編序〉，前揭書，頁 179。

⁴²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前揭書，頁 207。

⁴³ 〈遜齋易述序〉，前揭書，頁 153。

⁴⁴ 〈黎君易注序〉，前揭書，頁 155。

⁴⁵ 雖有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中有「《四庫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皆各集所長」一說，但郭伯恭已經詳辨其非了，說見《四庫全書纂修考》，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215-216。著名數學史專家錢寶琮也曾經提出一說：「四庫天文算法類書……篇後題名者胥屬紀昀、陸錫熊、戴震三人，昀與錫熊在四庫館皆總纂官之職，天文算法非所諳習。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筆無疑」，但司馬朝軍也為文詳辨之，說見戴震與《四庫全書總目》一文，圖書館雜誌，頁 68-69。但這都是指出某些篇章為某人所做，並未有直斥紀昀貪功之說。

⁴⁶ 昭槿，《嘯亭雜錄》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53。清人的筆記中更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記載，孫靜庵的《棲霞閣野乘》記載紀曉嵐好色的故事：「河間紀文達公，為一代巨儒。幼時能於夜中見物，蓋其稟賦有獨絕常人者。一日不御女，

妾媵」⁴⁷。但細究之，這在當時「妾媵猶在禮法中」⁴⁸，或許這就是紀昀會主張用寬容的態度來看待情慾的原因，畢竟能達到不起心動念的人少，能「禮不可逾，義不可負，能自製不行」⁴⁹，就難能可貴了，嚴格的禁止恐怕只會「必激而蕩於禮法外矣」⁵⁰，產生更多的假道學罷了。除了「頗蓄妾媵」外這樣的「小德出入」外，紀昀一生的行止並無愧於天地，並未見紀昀有追逐聲色、犬馬、貨利、喪行敗德的記載，稱他「大德不踰閒」，也無不可。他唯一的嗜好只有多蓄硯台這項文人雅趣，如同他在劉墉的贈硯上鐫道「余與石庵(劉墉)皆好蓄硯，每互相贈送，亦互相攘奪，雖至愛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聲色貨利相矜，而惟以此事為笑樂」⁵¹，話中除了展現出文人雅趣外，「太平卿相，不以聲色貨利相矜」也可看出紀昀自豪於身居卿相，卻清廉自守的一面。他的門生汪德鉞曾說出紀昀清白節儉的情形：「吾師居台憲之首，據宗伯、司馬之尊，登其堂蕭然如寒素，察其輿馬、衣服、飲食備數而已，其儉也若此」⁵²。筆者曾於 1999 年 7 月造訪紀昀閱微草堂故居，真的就如同汪德鉞所說的「登其堂蕭然如寒素」，如果不看門口的告示，這棟尋常人家的建築，讓人很難相信是「居台憲之首，據宗伯、司馬之尊」紀昀的故居⁵³(下面兩幅照片，左邊是筆者造訪時留影，右邊是裝修後樣貌)。

則膚欲裂，筋欲抽。嘗以編輯《四庫全書》，值宿內庭，數日未御女，兩睛暴赤，顴紅如火。純廟偶見之，大驚，詢問何疾，公以實對。上大笑，遂命宮女二名伴宿。編輯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宮女賜之。文達欣然，輒以此誇人，謂為“奉旨納妾”云、采蘅子纂的《蟲鳴漫錄》卷二也記載「飲食男女，大欲存焉……紀文達日必五度，否則病。」(廣文書局，1969，頁 46)。

⁴⁷ 〈伯兄晴湖公墓誌銘〉，《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379。

⁴⁸ 〈伯兄晴湖公墓誌銘〉，《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379。

⁴⁹ 《槐西雜誌》卷一，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247。

⁵⁰ 〈伯兄晴湖公墓誌銘〉，《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379。

⁵¹ 《閱微草堂硯譜》，紀昀著，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62。

⁵² 〈紀曉嵐師八十序〉，《四一居士文抄》卷四，汪德鉞，《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 12 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332。

⁵³ 筆者造訪時，連續劇《鐵齒銅牙紀曉嵐》尚未播映，該戲後來大受歡迎，紀昀故居也裝修成為觀光景點，原貌盡失。



當時不僅是他自稱清廉，連朝鮮使臣回還，書狀官沈興永在乾隆六十年(1795)向國內報告中國政治情形時，也曾提到紀昀「尚書紀昀，文藝超倫，清白節儉」⁵⁴，這在和珅當權時，導致吏治腐敗的清代官場上，確屬難得，也難怪會引起朝鮮外交官的注意。紀昀除了廉潔值得敬佩外，不依附權貴、同流合污的操守更是令人敬佩，嘉慶四年(1799)朝鮮書狀官徐有聞報告說「和珅專政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趨走，惟王傑、劉墉、董誥、朱珪、紀昀、鐵保、玉保等諸人，終不依附」⁵⁵，紀昀雖然不以道學自居，但這種儒家道德的實踐功夫，比起道學家來也是不遑多讓的⁵⁶，或許紀昀無法做到「學求有濟於天下」，但至少他做到了「行求無愧於聖賢」了。也難怪在民間傳說、戲劇中，常把紀昀、劉墉說成是和珅的死對頭，可見紀昀清廉剛正的形象早已深植人心。

(二)提要稿的修改

既然從文獻上看來，紀昀並非人品不堪之人，那他公開撒謊的可能性

⁵⁴ 《紀昀評傳》引《東華續錄》乾隆朝卷 120 語，周積明，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88。

⁵⁵ 《紀昀評傳》引《東華續錄》嘉慶朝卷 7 語，周積明，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88-89。

⁵⁶ 如果依照滿清貴胄禮親王昭槿的看法，理學之衰和和珅有莫大的關係「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權，正人與人梗者，多置九卿閑曹，終身不遷，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習理學者日少，至書賈不售理學諸書。」(《嘯亭雜錄·續錄·理學盛衰》條，(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503)、「自于、和當權後，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訴置正人，以文已過，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遂將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嘯亭雜錄·書賈語》條，(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17)，紀昀能堅守正道，身體力行聖賢之教，見諸實事而非徒托空言，環視當時「習理學者日少」、「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更是難能可貴。

也就不高，但是要如何消除這點疑慮呢？近來對《四庫全書》纂修官所撰寫的提要稿研究的成果，或可為此問題釐清一些疑惑。四庫館設有纂修官和總纂官，纂修官按照發下的校書單，完成校閱和擬定提要初稿後，即送交總纂官審閱核定，送交的提要初稿中，包含纂修官所撰提要、處理意見和記簽記錄。早有學者如葉昌熾、譚獻、黃雲眉、劉承幹、陳垣、尹炎武、郭伯恭、黃愛平等從評驚意見、篇目內容到風格體例、語言文字提及提要稿和後來刊行的《四庫全書總目》相較，發現兩者之間有不同程度的改易，有的則幾乎另起爐灶，全篇改寫。周積明引諸家之說而後論言：

由此可見，分纂稿誠然為《總目》的撰寫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從分纂稿到《總目》決非簡單的潤色修飾，而是一種脫胎換骨式的再改造。經過這番改造，原來的分纂稿被整合成以紀昀學術文化觀念為內核的新的提要系統。⁵⁷

但司馬朝軍卻對周氏之言不以為然，他認為：

以上各家所論大多只憑印象發言，沒有進行細致的對勘工作。「多所刪改」、「頗多異同」、「面目迥殊」、「殊異者殊多」等等，全是模糊語言，並無具體的比較分析，因而不足為據。至於「無有一編無

⁵⁷ 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頁 75-77。諸家所言，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卷四云：「乾隆中開四庫館，姚抱齋與校書之列，其擬進書題以今《提要》勒之，十但採用二三。惜抱學術與文達不同，宜其柄鑿也。」譚獻《復堂日記》云：「聞邵二雲先生集諸史提要，語見淵源，深知玄解，因檢官本互勘，多所刪改矣。」黃雲眉《邵二雲先生年譜》指出：「邵之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字句頗多異同。若《史記提要》、《後漢書提要》、《新唐書提要》則面目迥殊。」劉承幹《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序》云：「予愛讀《提要》，常欲求分纂提要諸人之書，以考校其異同。癸丑得翁蘇齋學士所纂提要手稿一百五十冊，則與今本《提要》殊異者殊多。」陳垣、尹炎武撰《影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亦指出：「現行《四庫全書總目》本擷取各書提要而成，後經文達筆削一貫，其間排列次第，與閣中所庋，出入固多，而尤以提要原文，相差太甚。原本提要與現行《總目》相對，無有一編無異同者，其通編不同，各類皆有，與《總目》互校，異同詳略，亦不勝列舉也。蓋文達《總目》原離本書而孤行，復與各類相呼應。……吻合提要原文，雅非所計。」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漫取文津閣書二十餘種與《總目》及邵（晉涵）氏分纂稿互校……邵氏原撰之舊已十不存一……《提要》各稿，嗣經紀氏畫一之後，則原撰者之意趣精神早已無存。……今之《總目》，則純屬紀氏一家之言矣。試校之《總目》與邵氏《分纂稿》，當知吾言之不虛也。」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全書總目》與今存各家提要稿，幾乎無一相同。」

異同者」、「幾乎無一相同」更是與事實不符。《紀傳》隨聲附和，焉能不以訛傳訛、錯上加錯？⁵⁸

所幸近年來對於提要稿的發現與比對的工作，有多位學者投身其中，他們就姚鼐、翁方綱、鄭際唐、程晉芳、余集、邵晉涵諸人的提要稿和《四庫全書總目》相比照，今試將其研究成果引述如下：

《惜抱軒書錄》與《四庫提要》頗多不一致處，從中可以看出紀昀是如何「損益」姚鼐提要稿，以使文風、批評標準與他篇保持一致的。⁵⁹

姚鼐撰寫的提要分纂稿共計八十六篇，計經部十二篇、史部十六篇、子部二十四篇、集部三十四篇，取名《惜抱軒書錄》（以下簡稱《姚錄》），該書收入《惜抱軒遺書》，於清光緒五（1879）年刊印行世。此八十六篇提要，筆者粗略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總目》）對照，發現兩者在編制體例、語言文字、提要內容、觀點看法等方面都存在某些差異，《姚錄》或多或少有所改動，有的改動較小，但尚可看出修改潤飾的痕跡，有的改動較大，面目全非，甚至則另起爐灶，全篇改寫。⁶⁰

（姚氏八十八篇提要）造成姚氏「分纂提要」篇幅變化的主要方式是對姚氏原稿的增改，增與改有時同時進行，分開而言，以增為主的提要有五十二篇，以改為主的提要有三十一篇。⁶¹

以上六大類（《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總計 1150 條。前三類所占比例為 49.39%，後三類為 50.61%換言之，一半以上為完全不同的，接近一半的提要稿經過不同程度的修改潤色，其增刪之跡還能比較出來。總之，從分纂官提要稿到《總目》定稿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⁶²

《提要稿》原稿完成後，屢經潤色，再經總纂等人反復修改。

⁵⁸ 司馬朝軍，紀昀與《四庫全書總目》，圖書館雜誌，2007：2，頁 73。

⁵⁹ 杜澤遜，讀新見姚鼐一篇四庫提要擬稿，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3，頁 43。

⁶⁰ 季秋華，從《惜抱軒書錄》看纂前提要與纂後提要之差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頁 40。

⁶¹ 徐雁平，《惜抱軒書錄》與《四庫全書總目》之比較，文獻，2006：1，頁 131-132。

⁶²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3，頁 202。

目前，除少數確實撰寫精當者為《四庫提要》全文採用外，《提要稿》與《四庫提要》多有差異。此正說明《四庫提要》非一次寫定，而曾屢經修改。不僅翁氏《提要稿》如此，見存其它四庫纂修官所撰提要稿，亦多與《四庫提要》內容不同。⁶³

三篇提要相比，鄭際唐初稿殊覺疏略，僅羅舉篇目而已……定本除行文更覺凝煉外……有高屋建瓴之趣，所謂「考鏡源流」者是也。蓋《四庫提要》均經紀昫筆削潤色，與原稿多有出入，而持論精闢，文風犀利，俱見紀氏才學迥出諸公之上。唯紀氏筆削提要，多未細檢原書，往往初稿不誤者，定稿反誤。⁶⁴

定稿行文較原稿曉暢，但有原稿不誤而定稿修改致誤者。⁶⁵

《四庫全書總目》因《四庫全書》的編修需要而產生，是由纂修官分別撰寫各書提要，再由總纂官多次修改、增刪而成。由於總纂官和纂修官的著眼點不同以及學術觀點的差異，總纂官對原撰稿進行了較多的修改，因此，纂修官的原纂稿和《總目》提要均有較大出入。邵氏《分纂稿》中的三十七篇原纂稿亦不例外。筆者曾將《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和《四庫全書總目》一一比對，發現無一篇相同，被總纂官全盤改寫的有《史記》、《後漢書》、《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記》、《明史》、《鄭敷文書說》等篇。⁶⁶

余集提要是現存《四庫全書》提要個人編纂的四家中的一家……其撰寫體制、內容與總目、閣本提要有諸多明顯的不同，諸如卷數作者生平和敘述內容與方式，以及粘貼處在書種卷目等，為其餘三提要所未見。⁶⁷

這些經過諸家詳細的比對(包括司馬朝軍的統計)，而下的結論：「《惜抱軒書錄》與《四庫提要》頗多不一致處」、「《姚錄》或多或少有所改動，有的改動較小，但尙可看出修改潤飾的痕跡，有的改動較大，面目全非，甚

⁶³ 樂怡，翁方綱纂《提要稿》與《四庫提要》之比較研究，圖書館雜誌，2006：4，頁76。本文係根據其碩士論文：翁方綱纂《四庫全書提要稿》研究(復旦大學2002碩士論文)節要而成。

⁶⁴ 杜澤遜，讀新見鄭際唐一篇四庫提要擬稿，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3，頁38。

⁶⁵ 杜澤遜，讀新見程晉芳一篇四庫提要分撰稿，圖書館建設，1999：5，頁71。

⁶⁶ 蘇虹，關於邵氏《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圖書館學刊，2005：4，頁130。

⁶⁷ 李祚唐，余集《四庫全書》提要稿研究價值淺論，學術月刊，2001：1，頁79。

至則另起爐灶，全篇改寫」、「(姚氏八十八篇提要)以增為主的提要有五十二篇，以改為主的提要有三十一篇」、「(《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總計 1150 條。前三類所佔比例為 49.39%，後三類為 50.61%，換言之，一半以上為完全不同的，接近一半的提要稿經過不同程度的修改潤色，其增刪之跡還能比較出來」、「除少數確實撰寫精當者為《四庫提要》全文採用外，《提要稿》與《四庫提要》多有差異」、「纂修官的原纂稿和《總目》提要均有較大出入。邵氏《分纂稿》中的三十七篇原纂稿亦不例外。筆者曾將《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和《四庫全書總目》一一比對，發現無一篇相同」、「其撰寫體制、內容與總目、閣本提要有諸多明顯的不同」，都再再說明了「此正說明《四庫提要》非一次寫定，而曾屢經修改」、「從分纂官提要稿到《總目》定稿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各纂修官所寫的提要稿還是和《總目》定稿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所以葉昌熾、譚獻、黃雲眉、劉承幹、陳垣、尹炎武、郭伯恭、黃愛平等人所言，並非「全是模糊語言，並無具體的比較分析，因而不足為據」，因為結論和具體比較的結果是一致的。而其中也確實有「邵氏《分纂稿》……筆者曾將《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和《四庫全書總目》一一比對，發現無一篇相同」全然不同的情形，因此黃愛平等人所言也並非全然「與事實不符」，進而周積明的推論又豈能說是「以訛傳訛、錯上加錯」？

既然弄明白了各纂修官善盡職責地撰寫提要稿，而總纂官也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接下來的問題是誰改的？有三位學者依據現存的提要殘稿來分析，一致認為這些提要稿的批改者是紀昀，今將其說法引述如下：

據筆者校閱，稿本中的批語有眉批、簽批、側批多種形式……，批改文字基本上是由一種流暢的行書筆體寫成，與上海圖書館藏本書影對照，行書批校的字體別無二致。據有關專家看後，認為是當時出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的紀昀所書。沈津先生通過與北京圖書館、湖北圖書館、福建圖書館所藏紀昀所批善本及上海圖書館藏《三松堂魚素檢存》所收紀昀書札比照，也判定是紀昀的手筆。⁶⁸

本文以天津圖書館珍藏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存稿本作為

⁶⁸ 黃燕生，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的再發現，中華文史論叢，48 集，頁 209。
(本文作者係中國歷史博物館圖書館館員)

依據，從著錄事項的增訂、提要正文的潤飾等幾方面舉例進行說明……因此，這部《總目》雖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瑤領銜編纂，陸錫熊參與斯事，實際上卻是紀曉嵐總其成的，我們從潤飾筆跡方面也能證明這一點。⁶⁹

本文簡要介紹了天津圖書館珍藏《四庫全書總目》殘存稿本的基本情況……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可以進一步證明《四庫全書總目》由紀昀總其成。……館藏這部《四庫全書總目》批校稿本，可以進一步證明《四庫全書總目》由紀昀總其成。我們首先從正文留下的眾多刪改筆跡查看：書寫字體草率，不求工整，不講章法，足以看出是出於書法不工者之手；增刪文字，信手拈來，一氣呵成，出口成章，非淹通四部者不能為之；再從文獻記載來看：曉嵐，身為鴻儒學士，然其書法卻是不工，斯事文獻也有披露。「近時紀曉嵐尚書、袁簡齋太使皆以不善書著名」（引清汲修主人撰《嘯亭雜錄》卷十），紀曉嵐也承認自己書法不工，他說：「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居能書而不能詩」（引紀昀傳《閱微草堂筆記》卷四）。「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今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云云。（引《纂修四庫全書檔案》2374 頁）。三從書法運筆手跡考察：檢故宮博物館藏紀曉嵐詩絕句 5 首和天津博物館藏紀曉嵐試帖 12 篇真跡運筆風格比較，顯然筆跡一樣。據以上三點分析判斷，這部《四庫全書總目》批校殘稿，出自總纂官紀曉嵐之手，亦即《四庫全書總目》之潤飾由紀曉嵐總其成。⁷⁰

以現存的資料看來，刪定提要稿的工作既然是由紀昀所為，那麼稱紀昀「一手刪定」、「一手裁定」《四庫全書總目》應無不可，也非虛言！

(三)閣本書前提要、殿本《四庫全書總目》

雖然就現今的資料看來，修訂提要稿的工作是由紀昀所為，但是或許會引起另一個疑問，那就是另外兩位總纂官陸錫熊、孫士毅究竟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成上有何作用？現在常見的說法是孫士毅任職短暫，陸錫

⁶⁹ 李國慶，紀曉嵐潤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舉例，山東圖書館季刊，2008：3，頁 75。

⁷⁰ 丁芬，《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8：8，頁 54-55。

熊入館較晚而又早逝，「始終其事而總其成者」唯有紀昀。首先來看孫士毅在四庫館的經歷，乾隆 45 年(1780)雲貴總督李侍堯貪瀆案發，孫士毅以失察遣戍伊犁，簿錄其家，不名一錢。乾隆嘉其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編成後，升太常寺少卿，復出為山東布政使、廣西巡撫、兩廣總督。乾隆五十二年(1787)設防潮州，防阻臺灣林爽文之師進入廣東。翌年率軍平定安南之變，出謀定策，指揮得當。後封一等謀勇公，授兵部尚書，立軍機大臣⁷¹。所以從乾隆 45 年入館算起，最早在 46 年第一部文淵閣四庫全書完成後外放，最晚則至乾隆 49 年北四閣四庫全書完成，孫士毅就已離開四庫館⁷²，因此任職時間短暫之說是成立的，而在《四庫全書總目》完成上，也應是三位總纂官中貢獻最少者⁷³。

至於另一位總纂官陸錫熊，其貢獻應是在於閣本書前提要，而不在於殿本《四庫全書總目》之上。考乾隆年間在撰修《四庫全書》時，形成了三種有所區別但又關係緊密的提要，也就是：分纂提要(提要稿)、閣本書前提要和單獨成書的《四庫全書總目》。這三種提要成稿的前後順序，應該說是分纂提要由分纂官執筆，成稿在前；閣本書前提要乃是總纂官依據分纂官提要稿改定後抄錄於書前，因此完成順序次之，至於單獨成書的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則是最後完成。提要稿乃各分纂官分別執筆所作，反映了各家之長、不同風格的學術觀點。書前提要是列在《四庫全書》七閣所收各書卷首的提要，所以是隨著七閣《四庫全書》的完成而完成。閣本的書前提要，現存文淵、文溯、文津三閣完整的書前提要，不僅彼此

⁷¹ 依《清史稿校註》本傳節錄，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12 冊卷 337 列傳 117，(台北)國史館，1986，頁 9327。

⁷² 文淵閣《四庫全書》於乾隆 46 年底抄畢，47 年入閣收藏。47、48、49 年依次完成其他北三閣《四庫全書》，而孫士毅修畢《四庫全書》後，先外放山東布政使，又依據《清史稿》卷 209 疆臣年表 6(《清史稿校註》第 8 冊，頁 6746)所載，他於乾隆 49 年(1784)接廣東巡撫，因此推測最早在乾隆 46 年，最晚在乾隆 49 年孫士毅即離開四庫館，筆者則依袁枚為孫士毅所撰的神道碑一文中「旋授山東布政使」所言，以為孫士毅應在 47 年即外放山東。

⁷³ 袁枚為孫士毅所撰的神道碑一文中僅稱：「簿錄其家，不名一錢。上嘉公廉，未至軍臺，起用為翰林院編修……旋授山東布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百一山房詩集·神道碑》，續修四庫全書第 143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363)，且士毅之孫孫均在《百一山房詩集·跋》(前揭書頁 516)中也未言及其祖纂修《四庫全書》之功。足見孫士毅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著力甚微，是以親友也不以為意，故皆未曾言及此事。

互異且水準參差⁷⁴，事實上三閣書前提要又和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有所出入，經過學者的研究發現，兩者之間仍有許多的差異，足見從閣本的書前提要，到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中間還是有許多修改的工作⁷⁵。至於《四庫全書總目》，早在乾隆四十七年即完成初稿，此時陸錫熊還曾自稱「臣等奉命纂輯《四庫全書總目》，現在編次成帙」⁷⁶、「宋曾鞏校史

⁷⁴ 《四庫全書》在成書後，曾作過兩次全面複查(乾隆 52、56 年)，而這兩次複查的起因都是從文津閣本被乾隆發現錯誤引起的。以文津閣《皇極經世書》提要為例，不僅有錯字，竟然有誤抄他篇文字的情形發生：「臣等謹案皇極經世書十四卷宋邵子撰邵子……本於釋氏之地水火風，且**五樓爲即古詩所爲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說詩，爲是書之瑕類矣。又史通補注篇稱是書有銜之自注，今本無之，又不知何時所佚也。**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恭校上」(粗體標楷體爲誤抄他篇文字，《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265)；而文淵閣提要「顯而易見，文淵閣書前提要內容過於簡略、單薄，其撰寫水平及其價值無法與《總目》提要相比。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是文淵閣《全書》遠存東北故宮，其作用只爲皇帝游幸時御覽，加之成書時間倉促，故經辦大臣爲簡省了事，多以館臣初稿所撰提要初稿稍加條理，即隨書抄錄而成。而館臣初稿粗精不等，且此閣只是備用，自然上下人等付出的工夫均不會如供御覽的文淵閣《全書》書前提要那樣工夫深湛」(陳曉華，《四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頁 64)；而「文淵閣《全書》的書前提要內容多與《總目》提要相近，由此可知文淵閣書前提要加工較多，而《總目》提要也多爲在此基礎上刪削潤色而成。粗略比較《總目》提要在定稿前對文淵閣《全書》約 1/3 的書前提要內容作了或多或少的改動。具體的分布則是經、集多異，史、子多同，名篇多異，一般多同。原因很簡單，紀昀擅長經、集而於史、子不諳；又名篇爲關注對象，所以紀昀等用力尤勤」(陳曉華，《四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頁 64)。

⁷⁵ 今略舉數家之言：「《總目》與庫本提要之間內容有不少差異，主要表現爲四個方面：同義替換、語序變更、詳略不同、評價微殊」(司馬朝軍，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與庫本提要之比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5：2，頁 63)、「顯而易見，文淵閣書前提要內容過於簡略、單薄，其撰寫水準及其價值無法與《總目》提要相比……文淵閣《全書》的書前提要內容多與《總目》提要相近，由此可知文淵閣書前提要加工較多，而《總目》提要也多爲在此基礎上刪削潤色而成」(陳曉華，《四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頁 62-64)、「就總體而言，閣書提要還不很成熟，在文字、體例、內容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反映了纂修官原撰提要向《總目》定稿進行過渡的情況。而《總目》在閣書提要基礎上，又經修改提高，全書體例整齊，思想統一，注重指示學術門徑，詳於內容介紹、文字考訂、得失評論乃至源流敘述」(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異同初探，圖書館學刊，1991：1)。

⁷⁶ 陸錫熊，恭和御制經筵畢文淵閣賜茶作元韻「中簿勤編勵省私」自注，《篁村集》卷 9，頁 7。

館書僅成目錄序十一篇，臣等承命撰次《總目提要》，荷蒙指示體例，編成二百卷。遭際之盛，實遠勝於鞏」⁷⁷，但是《四庫全書總目》卻是不斷地進行修改，遲遲無法刊定，直到乾隆 60 年 12 月 17 日，方纔刻竣⁷⁸，而此時陸錫熊已早在兩年多前(乾隆 57 年正月)，病逝於前往重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途中，因此與紀昀相比，在完成《四庫全書》的工作上，陸錫熊早歿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故而完成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任務，就要靠紀昀獨立完成了，況且《四庫全書》成書後，紀昀不僅多次參加覆校工作，改正不少脫誤之處。甚至直到嘉慶八年(1803)，紀昀以八十之高齡，還奉命主持參與《四庫全書》最後一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為《四庫全書》的修成及完善作出巨大貢獻，因此「始終其事而總其成者」之說，也是符合實情。但是陸錫熊任職四庫館的貢獻，應是和紀昀一同從事總纂官的工作，正如王昶所說的：

而特命陸君錫熊偕紀君昀任之。兩君者，考字畫之訛誤，卷帙之脫落，與他本之互異，篇第之倒置，蘄其是否不謬于聖人。又博綜前代著錄諸家議論之不同，以折中於一是，總撰人之生平，撮全書之大概，凡十年書成，論者謂陸君之功為最多。⁷⁹

其展現的成果，應是在他和紀昀、孫士毅所共同參與的閣本書前提要，因此陸錫熊其子陸成沅、其孫陸慶循所堅稱的「伏念先都憲公遭際盛時，所著《四庫全書提要》，懷槩握鉛之士無不共知」⁸⁰、「先子以文章學業受特達之知，自奉敕編輯各書外(自注：《四庫全書提要》外，有《通鑿綱目輯覽》、《唐桂二王本末》、《契丹國志》、《勝朝殉節諸臣錄》、《舊五代史》、《河源紀略》、《歷代職官表》、《八旗通志》各種，餘如《日下舊聞考》等書，

⁷⁷ 陸錫熊，恭和御制經筵畢文淵閣賜宴以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度閣內用幸翰林院……元韻注，《篁村集》卷 9，頁 10。

⁷⁸ 據《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甲午條記：「予告尙書曹文植奏，《四庫全書總目》刻竣。謹進陳設二十部，備賞八十部。餘將板片交武英殿收藏外，並另刷四部，請發裝潢，分貯四閣。至是書最易緝閱，應照向辦官書，刷印發坊領售。報聞。」(清代實錄館纂修，(北京)中華書局，1986)。

⁷⁹ 王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陸君墓誌銘〉《春融堂集》卷 55，續修四庫全書第 1438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219。「論者謂陸君之功為最多」，應屬恭維逝者的客氣話。

⁸⁰ 陸成沅，《篁村集》識語，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1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285。

亦代定體例)」⁸¹，應該是對其父祖盡瘁於《四庫全書》編纂辛勞的反映，似乎難以將《四庫全書總目》視為陸錫熊所完成的作品。況且在實際的運作上，陸錫熊於首部《四庫全書》完成後，「(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授大理寺卿，五十一年十二月提督福建學政，五十二年二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留學政任，以五十五年春任畢旋京」⁸²，在《四庫全書總目》工作尚在編纂進行中，就離開此職務數年之久，直到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乾隆下令第二次全面複查，陸錫熊才請自往校之，因而於次年正月病逝途中。等於在《四庫全書總目》初稿完成後的後續修訂工作，都未參與。今且舉邵雍所撰《皇極經世書》，來說明從閣本書前提要到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紀昀學術見解展現之例。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稱「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⁸³，對該書的不以為然，十分明顯。但在文淵閣《四庫全書》該書書前提要中稱「其取象多不與易相同，俱難免於牽強不合，然邵子在當日用以占驗，無不奇中，故歷代皆重其書」，雖有質疑，但因為歷代皆重其書，所以還是稱該書「皆立義正大，垂訓深切，是經世一書，雖明天道而實責成於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讖緯術數家所可同年而語也」⁸⁴，值得注意的是，書前提要又和《四庫全書總目》有所不同，後者對該書的質疑依然，「夫以邵子之占驗如神，則此書似乎可信。而此書之取象配數，又往往實不可解據」，但讚美之詞已然刪至「則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張朱間歟？」⁸⁵末了還加了一句反問語氣，透露著對邵雍該書盛名的幾許無奈，是以委婉的方式來表達對該書盛名的不以為然，已較書前提要更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同樣對該書盛名的不以為然，也在紀昀奉敕所撰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表達出來：「其說借易以推衍，而實無關於易，故朱子以為易外別傳，舊列儒家，

⁸¹ 陸慶循，《寶奎堂集》識語，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1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158。

⁸² 王昶，〈誥授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陸公墓誌銘〉，《寶奎堂集·墓誌銘》，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1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7-8。

⁸³ 《槐西雜誌》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251。

⁸⁴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子部數術類《皇極經世書》書前提要，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⁸⁵ 《四庫全書總目》卷 108，(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422-1423。

今改隸術數類焉」⁸⁶，將該書由儒家改列為子部數術類，不必出言批評，在將該書由子部儒家類改列為子部數術類，這個升降之間的用意，就可以看紀昀對該書的評價了。而從這修改之中，可以看出紀昀學術意見的展現。由此例來看，依照情形，在撰寫書前提要時，紀昀則是要和其他兩位總纂官陸錫熊、孫士毅進行意見溝通後才能定稿，無法全然表達紀昀的意見，但在《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紀昀就能以委婉的方式，來發揮自己的學術見解。

四、結論

經由前面的論析，對於紀昀撰修《四庫全書總目》這一問題，以下有幾點的釐清：

(一)《四庫全書總目》確有紀昀學術意見的展現。更多的例子尚須從紀昀所批閱的各種詩文集：《紀評蘇文忠公詩集》、《紀評文心雕龍》、《瀛奎律髓刊誤》、《玉臺新詠》、《王子安集》、《韓致堯集》、《玉谿生詩說》、《黃山谷詩集》、《鏡煙堂十種》(內含《唐人試律說》、《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李義山詩集》、《後山集鈔》、《庚辰集》……等書)，以及所寫的序跋、硯銘中去尋找。因為昀未有學術專論以闡述其理念，著述又未刻意保留，散佚甚多⁸⁷，其孫樹馨搜輯而成的《紀文達公遺集》，又以晚年之作為多，且偏重於應酬皇帝詩文，讓我們無法一探紀昀學術理念的全貌⁸⁸。在這些所評選的詩文集、序跋、硯銘中，紀氏學術見解即蘊

⁸⁶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417。

⁸⁷ 紀昀不願從事學術著作的心態應是「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盡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範圍」(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9)和「說者謂公才學絕倫，而著書無多，蓋其生平精力，已畢萃於此書(《四庫全書總目》)矣」(《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513 附錄引陸敬安《冷廬雜識》卷 1 言)；而文稿又不甚保留「生平未嘗著書，間為人做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9)。

⁸⁸ 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前言「收在《遺集》中的詩文，大約十不足一，這由他同時代人的記述，尤其是朋友和門人的回憶中可以得到證實。《遺集》所收，晚年之作居多，而壯年尤其是青年時代的作品卻甚少。這固然是因為後人搜集先人的作品，晚年之作易見而青壯年之作難得，也可能因為紀樹馨以為那些應酬上層人物尤其是應酬皇帝的詩文，乃是自家先人的最高榮寵，故《遺集》收之甚多，而那些戀人思友、抒情喻志、贊花月之美好、抒情中之忿懣的真情之作，尤其是描寫世態、諷刺社會醜惡的篇章，則收之甚少。譬如，不少的同代人都說他曾作

含於其中，雖然這些片言隻語的批評頗為零亂支離，不易整理，但卻是研究紀氏學術見解極具價值的素材，也是他詩論具體的成果，透過整理出來的資料和《四庫全書總目》對照，當可更清楚紀昀學術思想展現於《四庫全書總目》的情形。

(二)纂修官所撰的提要稿是有經過總纂官不同程度的去取修改。就現今的資料看來，手筆是出自紀昀，因此「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哀然巨觀」、「《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現行《四庫全書總目》本擷取各書提要而成，後經文達筆削一貫」諸家的說法，是成立的。有關各纂修官的提要稿，近有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張升教授彙編的《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和復旦大學圖書館吳格教授整理的《四庫提要分纂稿》已分別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在 2006 年同時出版，二書已將四庫分纂官提要稿大體網羅完備。相信透過二書全面的比對，當有更清楚與完整的研究成果，也相信和現今的研究結論相去不遠。

(三)經過紀昀筆削一貫、一手裁定、一手刪定後，所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其中所潛藏的「價值認同」和「價值認異」，無疑地，「《總目提要》之編纂，原為各纂修官於閱書時分撰之，嗣經紀昀增竄刪改，整齊劃一而後，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一人之主張而已」這樣的說法是成立的。因此當然可以從《四庫全書總目》中來探討紀昀的學術思想，至於乾隆政治態度影響到《四庫全書》的編纂，因此也可以從《四庫全書總目》中來探討當時官方的學術態度，視之為乾隆政治意識的展現，也未為不可。

(四)在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完成的過程中，陸、孫二人皆中途就離開編纂的工作，陸錫熊且不幸未親見《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最後是由紀昀所完成。簡單的說，提要稿可視為各纂修官學術思想的展現；閣本書前提要，可視為三位總纂官學術思想的展現；至於

《京官詩》數十首，而只存一首諷刺詩《小軍機》賴清人筆記以存，《遺集》則不一見。由於紀樹馨的去取標準所致，給讀《遺集》的讀者一個印象，似乎紀曉嵐只會寫那些拍皇帝老子馬屁的詩文。公允地說，據此描繪紀曉嵐的形象，是不完整、不全面的。」（《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

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則可視為紀昀學術思想的展現，各得其實，無所偏廢，應是公允之說。紀昀一來是首席總纂官，在完成《四庫全書總目》的過程中，不僅對纂修官的提要稿進行修改，甚至也有對其他總纂官的修改稿有審核的情形⁸⁹，足見紀昀的工作職務是有決定性的作用。二來，陸、孫二人皆未能全程參與，是紀昀始終其事而總其成者。其三，以《資治通鑑》作者掛名為例，劉昫、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皆有分任撰寫之功，然而後人論及此書，皆歸功於司馬光，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目》既然有親力為之、始終參與、決定去取之功，因此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榮耀歸之於紀昀豈曰不宜！

(五)《四庫全書總目》有兩種版本，一是由武英殿所刻的殿本，一是乾隆五十九年，由謝啓昆等人發起，據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刻成的浙本⁹⁰。兩版本雖然成書之時間接近，但浙本於乾隆 59 年即由民間發起鳩工刊刻，60 年事成，殿本則至 60 年 12 月才刻竣。可見浙本並非據殿本翻刻，兩種版本並不相同。浙本應是鳩集書前提要而成，如同前文所言，閣本書前提要和紀昀最後修訂完成的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仍存有若干的差異，因此若要引述《四庫全書總目》所言，以為紀昀之見解，則當依據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而非浙本《四庫全書總目》。

⁸⁹ 「從上海圖書館所藏提要殘稿分析，《辨言》重寫提要稿出自陸錫熊之手。在此篇提要旁另有朱筆批語：『依此本改』。四字審為紀昀手筆」，司馬朝軍，陸錫熊對四庫學的貢獻，圖書情報知識，2005：6，頁 56。

⁹⁰ 此版本成書經過具見於阮元〈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欽惟我皇上稽古右文，恩教稠疊。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特命如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兩省。論士子願讀中秘書者，就閣傳寫，所以嘉惠藝林，恩至渥，教至周也。《四庫》卷秩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錄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閱二閣，感恩被教，忻幸難名。茲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涵濡，歡騰海宇，豈有既歟！臣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之忱，識於簡末，以仰頌皇上教化之恩於萬一云爾」(《擘經室二集》卷八，《續修四庫全書》147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169-170)。